

■ 高教治理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4.02.005

学术动员:理解中国大学 学术治理的新视角



解德渤,张阳婕

(大连理工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大连 116024)

摘要:理解中国大学学术治理是解释学术产量剧增、推动学术治理现代化的认识起点。目前,学术界对集中于学术治理过程的“学术锦标赛制”和“学术发包制”以及着眼于宏观制度架构的“学术单位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但对存在于学术治理前期的“学术动员”关注不足。学术动员通常是动员主体通过项目设立、政策发布、指标下放、利益诱导、宣传鼓励、榜样示范等手段,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促使动员客体达到观念上的服从、认同乃至内化,从而调动客积极性能使其被动或主动地响应并参与到学术事务之中。在治理语境下,学术动员具有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和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三重意蕴。基于动员规模与动员方式,学术动员可划分为大规模刚性动员、局部刚性动员、局部柔性动员和大规模柔性动员4种理想类型。它们既有各自特定的适用范围,又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学术治理实践。在实践层面,当前学术动员已形成一套完整的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多层级动员机制,尤其是以行政力量为依托的“动员目标—组织建设—动员执行—检查验收”的动员链条成为其显性的运行机制,“接受动员—目标拆解—再动员”的动员链条是隐性的衔接机制。从制度更迭角度看,学术动员1.0版本是作为“运动型治理”的表现形式而存在,属于非常规治理模式;2.0版本是非常规治理的常规化;如今治理疲软现象时有发生,从“结果导向”到“以人为本”的实践转向可能是学术动员的3.0版本。

关键词:学术动员;学术治理;治理模式;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4)02004811

修回日期:2023110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大学学科建设的历史考察与实践机制研究(1949—2019)”
(CIA190277)

作者简介:解德渤,男,河北衡水人,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元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政治学研究;

张阳婕,女,山西太原人,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学术治理研究。

引用格式:解德渤,张阳婕.学术动员:理解中国大学学术治理的新视角[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2):4858.

Citation format: XIE Debo, ZHANG Yangjie. Academic mobilization: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4, 12(2): 4858.

一、问题提出

自 2004 年开始,我国科研成果产出数量堪称“爆炸式增长”,呈现“世界科研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1]。近 20 年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学术成果“爆炸式增长”?不少研究者试图对该现象背后的支配逻辑加以解析:第一种观点是“学术锦标赛制”,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解释。像刘海洋、阎光才、赵干、陈先哲等学者,从“科研激励”“考核压力”“等级系统”“评价体制”“信念共识”和“利益联结”等不同视角带领我们领略了学术锦标赛的整体图景^[2-5]。然而,“学术锦标赛制”重在描绘学术场域中激烈的横向竞争景象,难以解释国家、大学、学术人员之间复杂的纵向互动机制。第二种观点是“项目制”或“学术发包制”,如熊进、李立国、解德渤、曹妍等学者主要使用“发包—抓包”的关系,解释了不同行动者如何展开“自上而下”的纵向互动机制^[6-9]。但作为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载体,“项目”或“包”本身是以静态而非动态方式存在的。另外,“发包—抓包”同“学术锦标赛制”一样存在于学术治理过程之中,试问行动者们在发包和比赛之前是以何种方式做出行动的呢?第三种观点是“学术单位制”,张应强从中国特有的单位制度和单位文化出发,发现“学术单位制”是大学追求学术绩效最大化的底层逻辑^[10],从而完成了对中国特色学术治理模式的总体勾勒。但在“学术单位制”的宏观制度架构之下,与“学术发包制”和“学术锦标赛制”一并发挥作用的还有其他制度安排吗?

大家在学术领域经常听到“科研战线”“领军人才”“揭榜挂帅”等与军事活动有关的词汇。细细想来,我们确实可以将学术治理看作一场战争。只不过,现有理论多注重士兵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英勇杀敌的过程,却鲜少描绘将士出征前祭祀军旗、饮酒摔碗、齐喊口号的磅礴仪式,从而忽略了这种磅礴仪式给学术产出所带来的可能影响。特别是 2015 年“双一流”建设政策发布以来,各高校的学科建设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科研项目申报、学术成果评奖、“帽子人才”申请等活动均展现一幅“人人参与”的火热景象。这种愈演愈烈的现象背后除了“学术锦标赛制”“学术发包制”“学术单位制”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实践机制——“学术动员”在发挥着直接作用。每一位身处大学之中的教师都有直接体验,大学、学部、学院等经常开展动员大会以调动组织、群体或个人的参与积极性,这与“战前动员”可谓异曲同工。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学术动员”这一新概念来描绘集中于学术治理前期复杂的动员场景,给出我国学术治理呈现繁荣之景的另一种解释,继而为理解并完善中国大学学术治理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二、学术动员概念的提出

动员首先源自军事领域,即紧急状态下的军事动员,后来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都有着广泛应用,从而衍化出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的实践形式。当动员实践进入学术领域,就会涌现出大量的学术动员现象。通过对我国大学学术动员现象的简单勾勒,我们可以发现学术动员与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区别所在。在此基础上,学术动员的概念版图愈加清晰,即“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相互联结并缺一不可。

(一)对学术动员的简单勾勒

如果把“学术动员”视作一幅画卷,它应该是一幅水墨画,我们需要对其进行简单勾勒。这幅画既有“着墨”之处,也有“留白”之处,其中“着墨”之处是大家容易观察到的,往往以动员大会的形式表征出来。我们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纵向科研项目为例,对动员大会全流程加以解析:第一,学校人事部门将纵向课题的项目级别和经费额度,与教师个人的量化考核、工资待遇以及职称晋升等切身利益直接挂钩,即形成“人人可动员”的动员前提;第二,学校主管科研工作的部门(以下简称“科研院”)通知二级单位的科研秘书摸查并上报当年项目申请名单,即确定“谁能被动

员”的动员群体;第三,科研院牵头组织类似于“国家自科、社科基金申报经验交流会暨动员大会”的活动,面向符合申报条件的教师进行精准动员,科研院工作人员开展基金申报政策解读,财务处工作人员进行经费预算说明,申请成功者介绍中标经验与可能的误区,基金申请者针对困惑进行提问,即举办“全方位动员”的动员仪式;第四,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下发通知后,学校科研院向二级单位科研秘书下达通知,明确时间节点,如形式审查时间、学院报送申请书与排序名单的时间、学校资格审查与遴选的时间等,科研秘书再发给所有教师,即营造“抢时间”“争排位”的动员氛围;第五,对于项目成功获批者,特别是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学校官网、公众号、视频号等媒体平台对其进行宣传、报道,借助宣传媒介使榜样力量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新一轮的激励与动员,即产生“目标可触及”的动员预期。这个基金申报的动员会是我们可感可知的,其他的动员大会与之相似,只是由于任务内容与目标指向的差异,动员手段的选择与组合略有不同。

除了动员大会的“着墨”之处,容易被忽视的“留白”也是在学术动员画卷中需要解读的元素。轰轰烈烈的学术动员之所以声浪滔天,这离不开学科评估的制度力量,特别是评估指标对动员内容及其方向的支配力量,即存在评什么就动员什么的迹象。可以说,优绩主义影响下的学科评估指标是学术动员的核心内容,离不开“帽子”、项目、荣誉、身份等数不胜数的符号。以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为代表的国家级人才,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专项等为代表的国家级项目,以国家科技成果奖、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教学名师、一流学科等为代表的国家级荣誉,这些“国家符号”是高校异常关心的,动员受众基本是小范围的,是学术动员的重中之重。“国家符号”的设立仅仅是一个开始,省、市、高校为提前培育和孵化就会形成响应机制,将一流高校、一流学科、人才帽子、科研项目等指标按比例放大,形成各级各类的身份符码,从而进一步扩大动员对象的范围和规模,最终形成“校校有名头,人人为先进”的繁荣景象。从细微之处观察,“双一流建设加速跑”“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破浪前行、行稳致远”等条幅和标语在校园道路、楼宇随处可见,渲染着学术动员的气氛,并借助系列制度安排让教师们“躺下的站起来”“站起来地走起来”“走起来的跑起来”“跑起来的加速跑”。在多重影响下,“双一流”“加速跑”“乘势而上”“力争上游”等简短有力的口号成为老师、学生日常交流的高频词,无形之中塑造着思维方式、学术观念与具体行为,反映为学术动员刺激下的响应。这种响应有可能是积极主动的,也可能是消极被动的。概言之,学术动员通常是动员主体通过项目设立、政策发布、指标下放、利益诱导、宣传鼓励、榜样示范等手段,借助“自上而下”的行政体系,促使动员客体达到观念上的服从、认同乃至内化,从而调动客体的积极性使其被动或主动地响应并参与到学术事务之中。

(二)学术动员与其他动员形式的区别

学术动员与军事动员、政治动员、社会动员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几种动员形式在动员主体、动员客体、主客体关系、动员手段以及动员目的等维度上的区别(见表 1)。

就动员的主客体及其关系而言,军事动员的行动主体往往是军事首领,代替国家发号施令,其客体主要是士兵,有时平民百姓也会成为动员对象,主客体之间形成一种绝对服从关系。政治动员的主体是政治领袖,背后是国家或政党的力量,其客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它通常以政治领袖的指示为起点,以思想政治教育、宣传鼓励为媒介,进而在政治领域展开斗争。这种运行模式映射出政治动员的主客体之间主要是一种思想统一关系。与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相比,社会动员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动员,每次动员活动均由国家或不固定的社会精英发起,在共同利益感召下吸引社会民众自主参与,从而构成主客体“合意的共同体”,表现为民主协商关系^[11]。与其他动员形式相比,学术动员的主体更为复杂多元,既涉及“政府—科研机构—科研团队—科研人员”的主体链条,也包括“政府—大学—院系—教师”的主体链条。值得关注的是,在学术动员活动中出现了隐匿主体,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往往以“不在场”的方式支配着“在场者”的行动逻辑。学术动员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呈现出不同于“绝对服从关系”“思想统一关系”“民主协商关系”的另一种关系样态——“激励相容关系”。即学术动员之关系维系的根本,不是客体服从于主体的威权,不是主体控制客体的思想意识,也不是主客体之间平等协商,而是主体对客体的有效激励,使得客体反过来对主体自主响应。这样就会形成个体与组织之间、下级组织与上级组织之间的目标相容与价值相容。质言之,高等教育类市场化手段^[12]在学术动员中的制度嵌入,使动员客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正是动员主体所期望的结果。因为当利益最大化的客体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学术动员主体的利益就会不断扩张,从而实现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之间的激励兼容。

表 1 学术动员与其他动员类型的比较

动员类型	动员主体	动员客体	主客体关系	动员手段	动员目的
军事动员	军事首领	士兵、百姓	绝对服从关系	军令下达	赢得战争胜利
政治动员	政治领袖	全体社会成员	思想统一关系	思想宣传	实现政治目的
社会动员	国家、社会精英	社会民众	民主协商关系	协商合意	推动社会发展
学术动员	政府、组织、教师	组织、教师、学生	激励相容关系	多重激励	促进学术繁荣

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动员核心手段的选择。“军令如山,从令如流”完美地诠释了军事动员的核心手段——军令下达。当然,军事动员主体也会组合使用法律、行政、教育、宣传等手段。政治动员总是依赖政权组织、依托政治权威,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显示动员力量,但发挥着统一思想作用的通常是政治动员令、训令、宣言、声明、告人民书等,特别是那些朗朗上口的口号深入人心,即思想宣传是政治动员的核心手段。社会动员更加注重客体观念与行为的内化,其前提是动员主张与客体诉求之间的一致性,这就需要通过舆论引导、自愿参与、平等协商等方式,最终达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合意目标。在激励相容的学术动员关系网络中,不同动员主体形成了明显一致的动员手段偏好,他们更喜欢把资源分配、量化评价、绩效考核、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等与动员客体的切身利益关联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学术激励上的“合力”。但不得不说,当前的学术动员已经吸纳了军事动员、政治动员以及社会动员的制度精神,形成了一种既独特又混合的动员形态。比如,大学向学部、学院下达学科建设指标任务之时,就带有军事动员的“军令”性质;大学、学院与学科在迎评检查过程中的组织化动员,就表现出政治动员的“运动”风潮,类似于“加速跑”“创一流”的口号也有助于统一思想;大学与学部、学院就某些学术事务进行协商或讨价还价,则带有社会动员的“协商”色彩;大学在学术治理过程中,非常规化的学术动员又会使用常见的“激励”手段。

就动员的目的而言,军事动员、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分别以赢得战争胜利、实现政治目的、引导大众参与社会活动为目的。学术动员的目的在于,引导高校、科研单位、广大师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学术事务,促进学术繁荣。只不过,“为学术发展而动员”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有可能被异化为“为学术指标而动员”,从而导致学术组织和研究人员的注意力发生偏移,这是值得警惕并应引起深刻省思的现实问题。

(三)学术动员的三重意蕴

学术界关于“动员”形成了 3 种学说:工具说、实践说与制度说。其中,“工具说”强调动员是治理主体使用的一种治理工具或手段,梁颖、徐家良认可这种观点^[13-14]。“实践说”主张动员是治理主体发动人们积极参与其中的具体活动,潘泽泉、钟爽等秉持此观点^[15-16]。“制度说”认为动员是以科层制为核心的常规治理失效之时的一种替代机制——“运动型治理”,周雪光^{[17]125}、徐湘林^[18]持有该观点。当我们把动员置于学术治理场景,学术动员就获得了“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作为治理实

实践的学术动员”和“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三重意蕴。学术动员首先是一种治理工具,然后是一种治理实践,在根本上是一种治理制度。工具是实践的手段,是制度的载体;实践是工具的运用,是制度的表征;制度是工具的靶向,是实践的尺度。三者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共同构成学术动员的概念版图。

“治理工具”是理解学术动员的第一道密钥,属于学术动员的基本意涵。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有这样一句名言:如果你手中唯一的工具是锤子,那么一切事物看起来都像是钉子。这意味着,在学术治理“工具箱”里必然也必须摆放着多样化工具,而绝不仅仅是一种或一类工具。这要求相关行动者必须在恰当的学术治理场景下选择恰当的治理工具。具言之,“学术动员”与“学术发包制”“学术锦标赛”“学术台账”“学术工分制”“跨学科学术合作”“有组织科研”等都是学术治理的重要工具。有所不同的是,其他治理工具通常在学术治理过程之中发挥作用,而学术动员是在学术治理之前发挥作用。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学术动员是中国当代学术治理场景下的基础工具,其他任何一种学术治理工具的使用都离不开它,都需要与其形成工具组合。作为治理工具而存在的学术动员,还可以细化出不同类型乃至不同“型号”,恰如扳手分为梅花扳、开口扳、活动扳、套筒扳等不同类型的,开口扳手还可以细分为 7 号、8 号、10 号、14 号等不同型号。这提醒我们,绝不能怠慢对学术动员理想类型的分析,笼统地谈学术动员将大大削弱这一议题的内在张力。

“治理实践”是理解学术动员的第二道密钥,属于学术动员的具体表征。与其他学术治理方式相比,学术动员以一种显性化的实践方式而存在,即“学术何以动员”的实践过程或运行机制是可以被人们直接观察或直观体验到的。有研究者对公共危机中政治动员的运行机制进行剖析,并提出“应急目标、组织建设、动员执行以及政绩考核构成公共危机中政治动员的整体框架”^[16],从而揭示出政治动员的实践过程。但学术界习惯性地截取动员的某个片段加以分析,容易忽视不同层级之间从“动员”到“再动员”的转化机制。简而言之,学术动员的运行机制基本依循“动员目标—组织建设—动员执行—检查验收”的实践链条。但不能遗忘的是,“套娃式”的学术动员一层嵌套另一层,它涉及多层级的主客体,客体主体化的角色转换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不同层级之间的学术动员又是在何种机制作用下产生联动效应的呢?即学术动员运行机制的核心要件是导航系统、支持系统、操作系统、反馈系统以及联动系统等。从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学术动员,就必须正面回答学术动员的运行机制问题。

“治理制度”是理解学术动员的第三道密钥,即学术动员属于“运动型治理”的范畴,“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常规机制与动员机制是两个互为替代的治理机制,有内在的紧张和不兼容性”^{[17]128-129}。学术治理的常规机制往往是建立在明确的组织机构与稳定的制度安排基础之上的,如科层制、学术发包制、学术台账、学术评价等。学术治理的动员机制则是在紧急状态下的一种非常规实践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学术治理的常规秩序,在短期内提升了学术事务的工作效率。像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相继研制成功的原子弹和氢弹,就是以国家为后盾的学术动员的真实写照,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时至今日,学术动员正在逐步嵌入常规治理机制之中,发展成为一种既有独立气质又具有融合趋势的混合治理样态。这说明,学术动员正面临着“非常规机制”的“常规化”现象。频繁的学术动员不免出现动员疲软的情形,即学术动员的治理失灵问题是当前亟待破解的现实困境,如何走出困境?这就需要从制度更迭的视角观察学术动员的整体演化及其发展趋势。

三、作为治理工具的学术动员:理想类型的分析

最能体现动员特征的 2 个维度是动员规模与动员方式。根据规模大小,学术动员分为大规模动员与局部性动员。根据方式差异,学术动员包括刚性动员与柔性动员。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

型”为方法论指导^[19]，我们可以将学术动员抽象为4种类型，如图1所示。这种划分不仅有助于人们从理论层面洞察不同类型学术动员的特征，而且可以帮助实践者根据不同情景选择恰当的动员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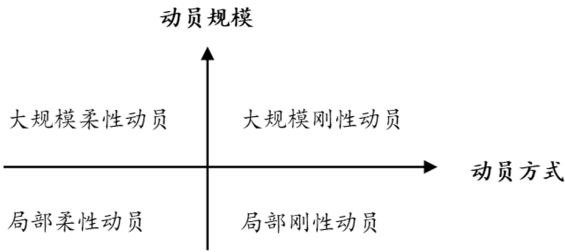


图1 学术动员工具的理想类型

（一）大规模刚性动员

位于第一象限的是大规模刚性动员，即学术动员规模比较庞大，动员手段带有强制色彩。这种动员形式常见于“双一流”建设、本科教学评估^[20]、学科评估等关乎质量的绩优项目，也常见于师德师风、学术伦理等关于良心的底线工作。就绩优项目而言，动员主体会集中各方力量，盘活全部资源，采用指示命令、指标分解、任务下放、问责追责等方式，使动员客体“动起来”，这是由上级压力传导而来的第一重响应机制。由于动员客体较多，加剧了有限资源竞争，进一步激发了动员客体的参与热情，这是由于横向竞争而产生的另一重响应机制。对于底线工作，动员主体通常会采用专项整顿会、应急处理、通报批评、签署承诺书等方式对动员客体的行为加以规约。比如，当出现学术不端、教学事故等严重问题之时，学校通常会依托大学科层体制与行政权力，对二级单位与一线教师展开全员动员和全员教育。大规模刚性的学术动员通常适用于学术事务性工作，具有时间短、范围广、手段硬的特点，从而要求动员客体快速响应、全员响应、高效响应，呈现出“运动型治理”的典型特征。

（二）大规模柔性动员

位于第二象限的是大规模柔性动员，即学术动员规模比较庞大，但动员手段较为温和。如果说大规模刚性动员是对大多数客体的行为进行塑造，那么大规模柔性动员更倾向于对大多数客体进行思想熏陶。比如，国家和大学有号召科研工作者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口号，还有像“破五唯”“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都是从思想层面引导广大科研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的时代洪流之中。此外，对重大科研成果、伟大科学家的新闻报道，一年一度召开的各级各类科研奖励大会，则是通过树立典型、榜样引领、奖励先进的方式，来引发学术界攻坚克难、见贤思齐的思想共鸣。通过各种场合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落实，“科研报国”“大学担当”“自立自强”等合法性话语深入人心，从而对激发学术热情具有动员之功。概言之，大规模柔性的学术动员通常适用于学术创新性工作，在动员范围上面向不确定群体，从而常常采取更为温和的方式。与大规模刚性动员相比，虽说大规模柔性动员在响应速度和效果上并不占优势，但它符合学术活动的创新本质，也满足了科研工作者的心理需求。

（三）局部柔性动员

位于第三象限的是局部柔性动员，即学术动员目标群体更加精准，动员方式更为温和。之所以针对该目标群体的动员手段较为温和，这可能与他们拥有较强的学术话语权有关，也可能因为有些学术任务具有弹性、非预期的特点。目前，入选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家人才计划的数量成为大学评价、学科评估的核心指标，因此学校会对有潜力的学者进行精准动员甚至是提前谋划。此时，学校面对“准帽子人才”采取柔性动员方式，但对学院下达“帽子人才”指标时又会采用刚性动员方式，即

行政权力在面对学者与组织时会表现出不同的科层气质,从而影响动员方式的选择。当面对非预期、弹性学术任务之时,动员主体会侧重唤起特定群体的认同感,使他们认可动员目标与内容,以此增强参与热情。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不少地方院校规定教师申报国家基金项目,无论成功与否,都计算相应的工作量。在此过程中,宣传鼓励、典型示范、参观交流、专题讲座、培训辅导等柔性手段更容易被精准的动员客体所接受。

(四)局部刚性动员

位于第四象限的是局部刚性动员,即学术动员目标群体更加精准,动员方式比较强硬。之所以针对该目标群体采取的动员手段较为强硬,这与可测量的、硬性学术指标相关,更与以“青椒”、博士后为代表的学术人员的弱势地位有关。学术动员的常见方式是动员会,但动员会并不是学术动员的唯一方式,像学术发包制、学术锦标赛、学术工分制与“非升即走”等制度安排都可以释放出动员力量。特别是,“非升即走”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了高校青年学者投身学术活动的积极性,使得外在的制度动员与内在的自我动员相互叠加、互相强化。不仅如此,绩效评价的周期是1年,晋升考核的周期是3年。如果晋升未成功,但考核达标可获得一次续聘机会,若第6年仍未晋升成功,就会被淘汰出局。这种时间压力、晋升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转化为学术生产的动力。“晋升名额限制、聘期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晋升机会的减少”^[21],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更多的学术工分是确保竞争优势的法宝。此时,硬性指标、考核时钟、晋升压力、工分焦虑、内卷竞争等一并演化为强有力的刺激手段与动员力量。

目前,治理主体习惯采用大规模刚性动员、局部刚性动员的方式开展学术动员,过于依赖刚性动员治理工具。诚然,这种工具的应用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学术产出、提升学术效率,但学术活动有别于其他活动,需要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长时间的刚性动员会使研究者疲于完成任务而难以潜心研究。因此,在选择治理工具之时,应注意刚性动员的副作用,适当增加柔性动员工具的使用比例。另外,动员工作并非一蹴而就,单一的动员工具作用有限,在复杂的动员场景中应结合实际选择多种工具进行优化组合,从而提升学术治理效能。

四、作为治理实践的学术动员:运行机制的剖析

学术动员的运行机理就是“关于如何进行学术动员才能得到有效响应”的基本原理。表面看来,学术动员是“动员主体—动员方式—动员客体”的显性运行机制,果真如此简单吗?在显性机制的背后,何种隐性机制在维持学术动员的多层级运转?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澄清。通过大量观察,我们可以初步绘制出学术动员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图,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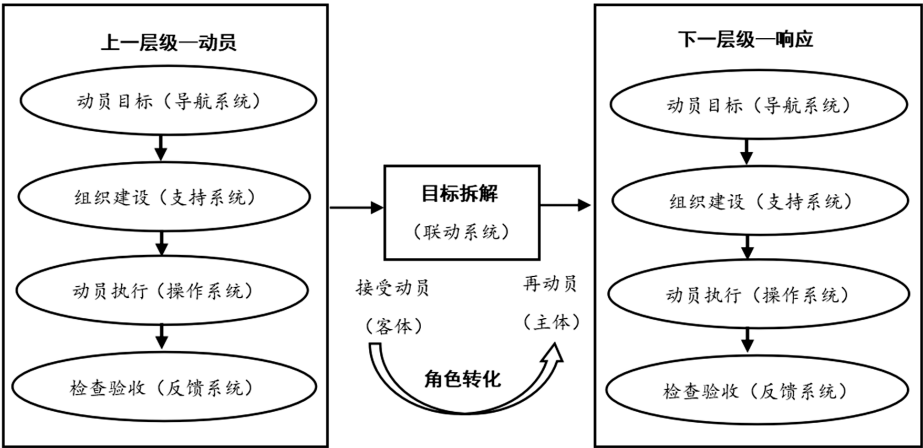


图2 学术动员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图

(一)显性运行机制

动员主体与客体表征为上下层级之间的一种关系结构,即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动员实践具有直接的驱动力,大致按照“动员目标—组织建设—动员执行—检查验收”的顺序渐次展开、环环相扣。第一,动员目标是学术动员的导航系统,引领总体方向。它通常是由学术动员主体设定的,在少数情况下属于协商结果。在“压力型体制”下,行政权力会选择将学术动员目标设定为刚性的,比如某高校明确提出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在下一轮学科评估中达到“A类学科过半”的目标期望。学术动员目标也有可能是弹性的,比如某学院提出“争取在即将到来的一级学科博士点申报中达到基本条件”。第二,组织建设为学术动员提供组织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支持系统。自上而下的动员目标与动员任务可以通过人事安排和规章制度来贯彻和落实。“政府—高校—学部(院)—系所”的组织结构本身为学术动员提供了组织载体,组织部、人事处、科研处、学科办等相关部门成为高校开展学术动员的“代言人”或“发令者”。各个部门制定的绩效考核标准、学术贡献指标、职称晋升规则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加快了下一层级的响应速度。第三,动员执行可以看作学术动员的操作系统。国家—高校、省市—高校这两对主客体之间的行政逻辑凸显,主体习惯采用政策制定、命令指示的刚性方式对高校进行动员。效率诉求、质量压力、社会关注、资源配置、大学声誉等都会衍化为高校“加速跑”的驱动力,使得动员执行变得理所当然。在高校—院系、院系—教师这两对主客体的动员实践中,主体通常采取任务下放、指标分解、思想动员等方式,使客体在行为和思想上与组织保持一致。第四,检查验收是整个动员过程的最终环节,也是学术动员的反馈系统。如果没有检查验收,那么动员执行效果将不可想象,所以检查验收的权力一定掌握在动员主体手中。检查验收的结果会影响主体在动员之时对客体做出的资源、待遇、职称等方面的承诺,也会影响下一步的动员目标、重点及其方式等。

(二)隐性衔接机制

学术动员运行机制中的核心要件是导航系统、支持系统、操作系统、反馈系统以及联动系统。前4种是行政力量驱使的显性运行机制,后一种是角色转换形塑的隐性衔接机制。它们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相互嵌套,共同构成一套完整的多层级学术动员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学术动员具有多层级性,在某种情境下的动员客体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就会转化为动员主体,学术动员的前一个完整结构与后一个完整结构之间的衔接机制在角色转换中悄然建立起来,大致形成“(原动员客体)接受动员—(新动员主体)目标拆解—(对新动员客体)再动员”的隐性衔接链条。接受动员的过程是一个观念重构的过程,即动员客体对动员主体确定的动员目标、任务、思想及行动等被动接受或主动接受的过程。如果是被动接受,客体主要是鉴于动员主体的权威而表现出服从态度;如果是主动接受,客体大多是出于组织发展或自身利益等因素而表现出思想认同乃至价值内化的态度。转换角色之后,下一层级的动员主体会依照实际情况对上一级动员目标进行拆解,拆解后的目标更为具体,当然,“层层加码”也有可能目标拆解中获得合法性。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可能导致学术动员运行机制不畅,甚至是动员失败。设定过高或过低的动员目标都有可能导致响应失灵,不完善的组织结构与不健全的制度安排会导致动员疲软,“一刀切”的动员执行策略会导致动员不力,模糊的检查验收标准会导致激励失效,角色转换中的沟通不畅会导致联动欠佳。也就是说,设定适切的动员目标是应对响应失灵的基本前提,组织重构、更换负责人与制度调整是应对动员疲软的组 织方略,根据动员场景、动员任务、动员客体选择恰当的动员方式是应对动员不力的权变思路,确定明确而合理的检查验收标准是应对激励失效的评价措施,建立动员主体与动员客体之间的交流渠道是应对多层级联动欠佳的沟通措施。

五、作为治理制度的学术动员:制度更迭的探讨

作为一种学术治理制度,学术动员与国家治理的整体制度环境是同频共振的。学术动员的制度

更迭符合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历程——政治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市场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服务导向的国家治理模式^[22],从而表现出相应的 3 个不同阶段的制度版本——以政治权威为基础的“运动型治理”、以经济激励为手段的“常规化治理”和以人文关怀为追求的“人本化治理”。

(一)学术动员的 1.0 版本:运动型治理

从制度性质上说,学术动员是一种非常规治理,是与常规治理相对的“运动型治理”,在紧急情况下或特殊年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与武力威胁,党和国家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运用到“两弹一星”的研制之中,打破了常规的学术发展模式,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力量等多方面资源协同起来,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创造了 10 年之内核弹爆炸、导弹飞行和卫星上天的伟大奇迹。此时的学术动员作为常规治理制度的替代机制,在打破常规治理层级的基础上展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逻辑,可以视为学术动员制度的 1.0 版本。时至今日,这种运动型治理的学术动员方式依然存在。

(二)学术动员的 2.0 版本:常规化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的激励手段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伴随重点学科建设制度的实施,特别是“双一流”建设政策推行以来,学术动员不再游离于常规制度之外,而是逐步嵌入科层制组织管理、学术锦标赛制、学术工分制等常规机制和学术优绩主义的共享观念之中,完成了从“看得见”的运动型治理模式到“看不见”的常规化治理模式的更迭。科层制赋予学术动员以组织保障,学术锦标赛制使动员客体持续面临着来自横向竞争的压力,学术工分制以数目字管理技术使动员客体时刻计算着学术回报,学术优绩主义的盛行又以非正式制度形式强化着人们的竞争观念,多重制度如同不断向上攀爬的藤蔓而彼此缠绕,支配着学术事务的日常运行。人们慢慢感受不到运动式学术动员的存在,但动员身影却无处不在,这就是学术动员制度的一次迭代,我们可将其视为 2.0 版本。这种“常规化”在学术治理中经常面临失灵或疲软情形,即动员作用不显著。为什么呢?这样的学术动员就像“打鸡血”,短期见效,但长此以往,弊病就会暴露出来。组织和个人都难免倾向于选择“短平快”的科研方式,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科研歪风抬头,学术内卷加剧,难以产出重大科研成果,从而导致学术虚假繁荣。

(三)学术动员的 3.0 版本:人本化治理

近年来,“破五唯”的呼声高涨,这是对学术评价问题的强力呼喊,也包含着对泛滥的学术动员、结果导向的学术动员之奋力反抗。注重短期结果的学术动员,只强调学术任务的“完成逻辑”,而忽视学术研究的创新本质对周期之长、节奏之慢、心态之静的特殊诉求。为什么科研人员对频频的学术动员产生倦怠、疲乏?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今天的“学术动员”侧重“动员”形式,而忽视了“学术”本真。因此,不禁发问: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动员?显然,理想中的学术动员应着力激发科研人员的内在动力和潜力,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勇于探求真理,敢于挑战科学“无人区”,真正成为学术而奋斗的内化观念与自觉行动。也就是说,学术动员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何以实现?其一,动员主体要采用宣传示范、参观交流等感化手段,这样动员客体更容易从内心接受动员而不是排斥动员;其二,动员客体要听从内心召唤,不随波逐流,争取自我解放。此时的认知不再是“动员自己参与学术事务”,而是“动员自己参加更有意义的学术事务”;第三,优化学术环境,完善相关制度。过大的竞争压力导致科研人员的职业倦怠和挫败感,影响着高质量成果产出。只有营造出更包容、更宽松的学术环境,我们距离科技强国的目标才会更近一些。这就需要在学术评价、学科评估制度改革上下功夫。因此,从“结果导向”到“以人为本”的实践转向,或许会成为学术动员的 3.0 版本。

六、结 语

“学术动员”与“学术锦标赛制”“学术发包制”“学术单位制”等一同构成了中国大学学术治理相对完整的解释框架。学术动员为我们理解并完善中国大学学术治理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学术动员不仅是一种治理工具,还是一种治理实践,更是一种治理制度,内蕴意蕴丰富,值得深入挖掘。学术动员现象的产生并非偶然,它在学科评估、绩效评价、资源分配以及学术声誉等一整套学术评价制度的加持下,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我们对学术动员本身理应秉持中立态度,既不能盲目批判,也不能简单迎合。这是因为学术动员在我国大学学术治理情境中具有深厚的制度土壤与实践基础,许多问题还没有形成具有明确证据支持的结论,所以仍然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相关的理论解释和实践调查。比如说,“学术动员的制度根基何在”“学术动员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动员”“学术动员如何能够在尊重学术规律的前提下发挥动员作用”。这些理论问题或实践问题都尚未得到完全解答,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可能方向。

参考文献:

- [1] 钟布. 中国科研成果缘何没有得到世界重视? [N]. 联合早报,20130418(01).
- [2] 刘海洋,郭路,孔祥贞. 学术锦标赛机制下的激励与扭曲: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学术界的高数量与低质量? [J]. 南开经济研究,2012(1):318.
- [3] 阎光才. 学术等级系统与锦标赛制[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10(3):823,187.
- [4] 赵干. 我国科研评价中的“学术锦标赛”体制及其作用机理研究[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2(3):2430.
- [5] 陈先哲. 学术锦标赛制:中国学术增长的动力机制与激励逻辑[J]. 高等教育研究,2017,38(9):3036.
- [6] 熊进. 科层制嵌入项目制:大学学术治理的制度审视[J]. 现代大学教育,2016(3):1522.
- [7] 李立国,张海生. 高等教育项目治理与学术治理的张力空间:兼论教育评价改革如何促进项目制改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7(5):135145.
- [8] 解德渤,于孟仟. 学术发包制: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治理模式[J]. 重庆高教研究,2022,10(2):816.
- [9] 曹妍,唐珊珊,荀渊. 项目制背景下激励机制对高校 SSCI 科研产出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4—2018 年 36 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面板数据分析[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0(7):8599.
- [10] 张应强,周钦. 从学术单位体治理走向学术共同体治理:我国大学学术治理改革的基本方向[J]. 高等教育研究,2022,43(2):3141.
- [11] 蔡志强. 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40143.
- [12] 张应强,张浩正. 从类市场化治理到准市场化治理: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方向[J]. 高等教育研究,2018,39(6):319.
- [13] 梁颖. 关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的思考[J]. 学术论坛,2003(6):3439.
- [14] 徐家良. 危机动员与中国社会团体发展[J]. 中国行政管理,2004(1):7478.
- [15] 潘泽泉,欧阳小鹏. 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专项治理行动中有效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基于 C 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5):7380.
- [16] 钟爽,朱侃,王清. 公共危机中政治动员运行机制研究:基于 2015 年以来 38 个重大公共危机案例的分析[J]. 政治学研究,2021(2):7996.
- [17] 周雪光. 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研究[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 [18] 徐湘林. 中国政策过程中的科层官僚制与政治动员[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6):119125.
- [19] 马克斯·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杨富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85.
- [20] 钟凯凯. 大学评估运动:“组织化动员”的概念、特征与悖论[J]. 浙江社会科学,2012(5):149151,160.
- [21] 刘进,王辉. 什么才是真正的“非升即走”[J]. 重庆高教研究,2020,8(5):4454.
- [22] 辛万鹏,赵青.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J]. 特区经济,2015(10):1921.

Academic Mobilization: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XIE Debo, ZHANG Yangji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s the starting point to explain the increase of academic output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academic governance.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carried out fruitful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n the “academic tournament system” and “academic outsourcing system” which focus on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process and the “academic unit system” which focus on the macro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but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academic mobilization” which exis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governance activities. Academic mobilization usually involves mobilizing subjects to promote conceptual obedience, recognition and even internalization of mobilized objects through the means such as project establishment, policy releasing, indicator decentralization, interest induction, publicity and agitation, and example demonstration by means of a “top-down” administrative system, so as to arou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object and make it respond passively or actively and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affairs. In the context of governance, academic mobilization has three meanings: academic mobilization as a tool of governance, a practice of governance and a system of governance. Based on mobilization scale and mode, academic mobiliz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ideal types: large-scale rigid mobilization, local rigid mobilization, local flexible mobilization and large-scale flexible mobilization. They not only have their own specific scope of application, but also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jointly affect the academic governance practice. At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current academic mobilization has formed a complete set of multi-level mobilization mechanisms that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crisscrossing and nesting each other. In particular, the mobilization chain of “mobilization goal-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mobilization execution-inspection and acceptance” based on administrative power has become its dominant operating mechanism. The mobilization chain of “acceptance mobilization-target disassembly-re-mobilization” is an invisible linkage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cademic mobilization version 1.0 exists as a manifestation of “campaign governance” and belongs to an unconventional governance model. Version 2.0 is the routinization of unconventional governance, and now governance weakness occurs from time to time, so the shift from “results-oriented” to “people-centered” practice may be the 3.0 version of academic mobilization.

Key words: academic mobilization; academic governance; governance mode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